

“武吉摩新村”历史及其前后时期的马共活动*

History of “Bukit Mor New Village” and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Activities During That Period

邱克威**
(KHOO Kiak Uei)

摘要

武吉摩新村设置于1950年，到1954年解除“黑区”，村民开始重获生活上的自由。当年设置新村之时，将武吉摩周围十余个村落的华人统统强迫迁移，并在原有的武吉摩村落四周围起了新村。这些村落的华人很多都搬进了新村。新村内的公共设施很缺乏，村民的生活作息都受到严格管制，各种生活资源也受到限制；加上马共与英军间频繁的枪战，以及来自双方的威吓与胁迫，村民在物质与精神上都备受磨难。实际上早在紧急状态之前，武吉摩一带的华人已经遭受过马来人的排华屠杀与焚毁房屋，当时所幸有马共抗日军的保护以及从中斡旋，才得以逃过一劫。不论从新村设置前后时期还是单就新村本身的发展来看，马共在当地的的活动都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的。因此本文从新村前华人村落情况入手，包括新村设置前后马共在当地的的活动，最后对新村围篱的范围以及新村内的守卫及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做调查整理。我们通过新村的设置以及其前后史实的详细调查，以此真实还原武吉摩的这一段历史。

关键词：新村、武吉摩、巴冬、马来西亚华人历史

Abstract

Bukit Mor New Village was set up in 1950, and in 1954 it was declared a ‘white area’. The villagers henceforth regained their freedom. During the setup of the new village, Chinese villagers from around Bukit Mor area were all forced to leave, and a fence was put up around Bukit Mor to form a new village. Most Chinese villagers from the surrounding areas moved into the new village. Public amenities in the village were scarce, and the villagers’ livelihood was strictly under control. Apart from this, resources were limited. The frequent gunfights between the communists and the British armies, and the threats and intimidation from both sides, added even more trauma to the villagers. In fact, before the Emergency period, there was already intense anti-Chinese sentiments. There were rampant killing and arson by the Malay community. It was the communists then that protected them, and prevented the conflict from

* 本文的所有采访与口述调查工作均属于巴冬永春会馆资助的“巴冬历史与文化调查研究项目”下所展开。该研究项目由笔者与蔡慧钊共同执行。此外要十分感谢林意先生与张礼铭先生协助调查工作并提供重要的相关历史文献资料。

** 邱克威博士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助理教授。电邮地址：kiakuei.khoo@xmu.edu.my

escalating. Regardless of before or after the setup of the new village, it is important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mmunists within the region. Therefore, this paper's narration shall start from the Chinese settlement before the new village, including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mmunists, and conclude with a thorough account of the new village and the villagers' livelihood within it. By doing this, we hope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Bukit Mor during this period.

Keywords: New Village, Bukit Mor, Parit Jawa, history of Malaysian Chinese

一、前言

“新村”（New Village）指的是马来亚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时期，英殖民政府为了孤立山林间进行游击战的马来亚共产党武装，而将散居各地的华人集中移植于铁丝网包围下的固定村镇，并通过守卫、门禁、物资限制、不定期搜查等手段进行严格监管。

移植新村运动，从1950年6月至1952年底基本完成，此后仅个别在吉打州和内陆地区有新设立的新村。（Sandhu, 1964）至于新村的总数，各方记载的统计不一，而较可信的应为480个。（林廷辉与宋婉莹 2002: 19）在整个运动当中，总移植人口约573,000，几乎都为华人；而根据1954年的人口统计，新村内人口86%为华人。（Sandhu, 1964）

这样大规模人口移植，五十余万华人被迫背弃家园，置于铁丝网内过着高度限制与监控下的生活，无怪林廷辉与宋婉莹（2002: 1）称：“新村历史沾满了泪水与血汗，有诉不尽的悲愤与伤痛。”而从国家社会层面上，Sandhu（1964）则说：“这场运动重塑了马来亚的人口结构。”¹

尽管如此，半个多世纪来对新村的材料整理与研究论著却不多。较早的完整调查有Corry（1954）提交给当时英政府马来亚联合邦最高专员麦基里莱（Donald MacGillivray）的新村普查报告书，而重要的研究专著仅如Ray Nyce（1973）、林廷辉与宋婉莹（2002）、潘婉明（2004），都偏向于宏观概括式记述。至于个别新村则零星有些报道式文章，以及一些资料集如胡一刀主编《爱新村——雪州华人新村的美丽与哀愁》（2012）。当然可喜的是，近年开始较多关注各地村镇华人历史的撰述，对新村时期的史实做了调查，整理了有价值的历史口述记录，比如廖文辉（2012）的彭亨州直凉新村调查、何启才（2014）调查的雪兰莪州锡米山新村、彭西康（2016: 48-67）调查霹雳州务边的两个新村等等。

根据1954年的统计，全国设置的480个新村中80%在马来半岛，而其中近半数设于霹雳州与柔佛州。（Sandhu, 1964）本文调查记录的武吉摩新村（Bukit Mor），正是位于柔佛州内。林廷辉与宋婉莹（2002: 16）曾慨叹：“对于华人新村的故事，很多新一代的华裔子弟都已说不上来。”本文在对武吉摩新村，以及临近的巴冬（Parit Jawa）所设置的“新村”进行口述历史调查时，发现不仅新一代华人子弟，即使身历其境的当事人对许多史实都开始印象模糊；乃至产生争议，比如巴冬是否设置新

¹ 原文为：The movement has remoulded the population pattern of Malaya.

村，以及何时解除“黑区”等。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一番详尽的梳理论述。²

巴冬，据其马来地名又中译为“巴力爪哇”，意即爪哇人的港口。根据早期文献记载，相传是由一个被贩卖至此的印尼爪哇奴隶所勤奋开垦，并以此获得柔佛苏丹封为“巴力爪哇酋长”（Chief of Parit Jawa）。³（Mohamed Hashim, 1931）巴冬属于柔佛州麻坡县的一个市镇，武吉摩则是其辖下的一个区。然而由于历史形成的习惯称法，民间口里“巴冬”指海边渔村至大街一带，而“武吉摩”则是仙师宫附近一带。其中方言族群上前者为潮州人聚居地、后者则是福建人聚居，以永春人为主；经济形态上也各有特色，即前者为渔业，后者则有锡矿与石矿。巴冬则因处于麻坡南向峇株巴辖的主干道上，因此地理位置更为重要。

二个地区的开埠时间基本相当：巴冬海边的翠美古庙最早的横匾落款为“光绪丁丑年”（1877）⁴，而武吉摩的仙师宫有一座石炉则刻“同治十一年”（1872）。从战前开始，二地就已聚居较多人口，各自形成较大的市集；连同武吉摩往东约三公里处丁字路口的“十支”，是那一带战前三个人口较集中的村镇，同时也是那一带散处各地的华人村落的三个市集中心。

由于北连麻坡、南接峇株巴辖与永平，这一区域在日本侵略战中发生了几场大的战役，因此对于抗日军活动也是重要据点。于是英殖民当局宣布紧急状态期间，巴冬和武吉摩都围起了“新村”。

林廷辉与宋婉莹（2002：145-181）的全国新村列表中有“武吉摩”和“巴力爪哇”二地，显示巴冬和武吉摩二地均曾设置新村。实则巴冬的大部分地区，由大街——当地居民称做“车头”——到海边渔村，并未围起铁丝网；关于“巴冬新村”，采访所得的资料都指出仅仅是警察局与华育小学之间曾围起一道铁丝网，但并不存在一个四面包围起来的围篱。⁵而且在这道铁丝网的另一面，即警察局往西到海边渔村范围内

² 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本文多依赖口述资料进行补充。本文采访对象人数众多，许多是彼此相互印证。其中提供重要历史资料的包括：巴冬居民张亚娘（92岁）、谢岳逢（84岁）、徐国良（80岁）、徐清爽（76岁）；武吉摩居民陈彪太太（81岁）、苏江河（78岁）、林忠义（78岁）、林意（75岁）。除了徐国良兄弟，其余人采访时间分别在2017年6月13日-16日、8月27日-9月1日、11月22日-26日在当地进行；徐国良兄弟的采访则于2017年12月16日在吉隆坡进行。

³ 中文地名“巴冬”为马来语Padang一词的闽南方言音译。19世纪末以前，Padang作为地名早于Parit Jawa，当年这位相传为开埠者的爪哇奴隶最初就是卖给了“巴冬酋长”（Chief of Padang）。而作为地理概念，Padang一词指称的范围也许包含麻坡郊外沿海的平原地区，当然也包括目前的Parit Jawa。（参看 *The Straits Times*, 1910）或许由于Parit Jawa地区从运输武吉摩的锡矿与石矿，以及自身种植业的发达，尤其华人大量定居，社会文化经济等高度发展，于是民间袭用Padang以专指这一地区，久而久之就成了专名，故至今中文地名仍作“巴冬”。这与“吉隆”由泛指Klang与Kuala Lumpur地区，到后来专指Kuala Lumpur的情形略同。

⁴ 翠美古庙主祀清水祖师，应属于闽南人的神庙；如今由潮州人管理，实则是因为较早前这里本是同安人的渔村。根据1895年10月8日《叻报》记载，当年巴冬同安渔户约三百余人，因一场瘟疫死了百余人，清水祖师“乩示诸人着数迁居”，因此全都尽数搬离。（《叻报》，1895）

⁵ 林廷辉与宋婉莹（2002：149）：“全国452个新村的成立年份及人口进展”列表中，“巴力爪哇”的成立年人口为1,200人。这个数据应是整个巴冬地区，即海边渔村以至于大街一带的人口总数。而且尤其列表中的“人口进展”数据来看，70年代之后人口剧增，至1995年为4,500人。这正符合巴冬海口渔村1970年代之后，由于建设水闸与防潮堤坝，解决了海水涨潮淹没土地的问题，渔村人口激增的情况。

的村民生活并未受到门禁或搜查行动等管理限制。除此以外，2001年的一份采访记录中，当年82岁的巴冬村民钟喜开也曾提到“在巴冬并没有所谓的新村”。（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 2003：299）由此可见，所谓“巴冬新村”似乎并非通常理解的新村，而仅仅是大街一带以铁丝网进行部分区域的隔绝。至于这道铁丝网的具体位置，则村民都已无法描述得十分详细。⁶

武吉摩新村则不一样，当年实实在在是铁丝网围篱圈起了一个新村，进出受到严格检查并实施门禁，而且其受迫迁范围及人数较大较多，当地的马共活动也相当频繁。本文即主要论述武吉摩新村的歷史，由其迫迁居民的原居地分布、围起新村前后的马共活动、新村内的状态及村民活动，以至于宣布“白区”时的情况等做一番史实记录。

二、新村前的状态与居民分布

武吉摩一带华人居民是随着1860年代开采锡矿事业发端而从外地迁来的（张礼铭，2016），其中开埠先驱之一的林文图从马六甲带来四百余名矿工是有历史记载的（郑昭贤，2018），同时根据柔佛王朝内务大臣的报告，1869年当地拥有二十个锡矿场，客家人矿工人数四百至五百人。（张礼铭，2016）

由锡矿带动其他事业的发展，因此福建人、潮州人、客家人、广西人等陆续迁来；就在当初武吉摩运送锡矿与石矿等物资经巴冬再转麻坡的“有轨车道支线”（branch railway）起点⁷，居民建起了锡矿业的特有神庙——仙师宫。（郑昭贤，2016）于是在仙师宫一带形成一个市集，沿着大路两旁聚居人口也多了起来。种植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橡胶园纷纷开辟，各地地主以及橡胶业相关工人及其家庭也开始零零散散地形成了多个华人聚居村落。

综合各方口述资料所显示，围起新村之前，由武吉摩往东向十支这二个大市集之间的大路两旁遍布着十余个大小不一的华人村落。

从武吉摩算起，首先是仙师宫后面的一个村落，不足十户人家，当地人称为“仙师宫后”；大路往东的左边向里面进去是“巴力加心”（Parit Kassim），这里人口较多，拥有一个河道码头，当地地主为林时家族，源自永春外山乡云峰村，是当地的望族，同时还住着多户马来割胶工人家庭（蔡慧钏，2017）；再向里进去则是“天针发”，住着几户华人家庭，后来的武吉摩马共领导“锦团”（当地人口称“Jin-ah”）就曾住在这个村落；沿着大路继续往东在右边一条小路进去是“福山亭”，这里是福建人的义

⁶ 目前英殖民政府关于新村调查的最早一份报告中，新村总数为439（Corry 1954：45-50），其中并未列入武吉摩与巴冬；但从总数来看，似乎这份报告中的新村总数本就漏略不少。因此不能仅凭这份报告就说巴冬并未设置新村。但根据目前调查所得的资料来看，至少关于巴冬是否曾经设置新村就得进行一番详细论证。

⁷ 一般人口传武吉摩连接巴力爪哇再转至麻坡为铁轨车道，并运行蒸汽火车。比如2017年在武吉摩底下挖掘到百年前充作车轨的木块，报章纷纷报道为“百年火车轨道”，并称：“因早期的火车是靠蒸汽行驶的，该处应该是以以前火车停下来要添水的站点，应该是火车铁轨。”（《星洲日报》，2017）实则根据早期的口述报道，武吉摩至巴力爪哇一段实为木头车轨，且是由牛拉的载货车。（George，1955）其实英文railway意即“有轨车道”，当然也往往特指“火车车道”，因此若不稍加辨析很容易让人误解为特指火车。

山，埋葬当地永春人以外的福建人，以南安人为主，因此民间又称“南安山”，这里住着几户华人家庭；再往里则是“福美山”，更往里则是“全兴山”，都住着几户华人家庭；通向“福山亭”的路上左边有条分岔路可达石矿，沿途有个村落住着几户华人家庭，主要是石矿的矿工，这个村落当地人就叫“石山”；石矿山山顶上还有几户华人家庭的村落，当地人叫“石山顶”，这些人并非沿着“石山”村落往山顶迁移的，而是由山背面迁上山顶，同样是石矿的矿工；沿着大路再前行则是“牛坡”，有十余户人家，主要都是那一带橡胶园的园主及其割胶工人家庭，此外还有马来工人家庭；继续沿着大路前进的右边就是永春义山，在义山上有几户华人家庭的聚落，当地人叫“冢山”；在其对面大路的左边则是“冢山下”，这里住着十来户华人家庭，马共领导“锦团”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在紧急状态时期就都住在这里；沿着大路再往前，在亚逸马尼（Air Manis）的大路右边进去住着十余户华人家庭，这个村落叫“五百格”，这里在战后排华时期遭到严重屠杀，房屋也严重烧毁。

最后，大路的尽头就是一个丁字路口，即“十支”，因其由麻坡沿着巴口路（Jalan Bakri）到这里的距离十英里而得名，这是麻坡通往永平镇的重要路口。作为连接当时几个重要华人村镇的路口，“十支”在战前就已经非常繁荣，路口两边周围都是住户和商铺。在战后并成为抗日军在当地的大本营。由于战后马共以当地为根据地，并且非常活跃，因此紧急状态时期整个村落遭到严重空袭，完全夷为平地；如今空荡荡的样子，完全无法想象这里曾是一个热闹的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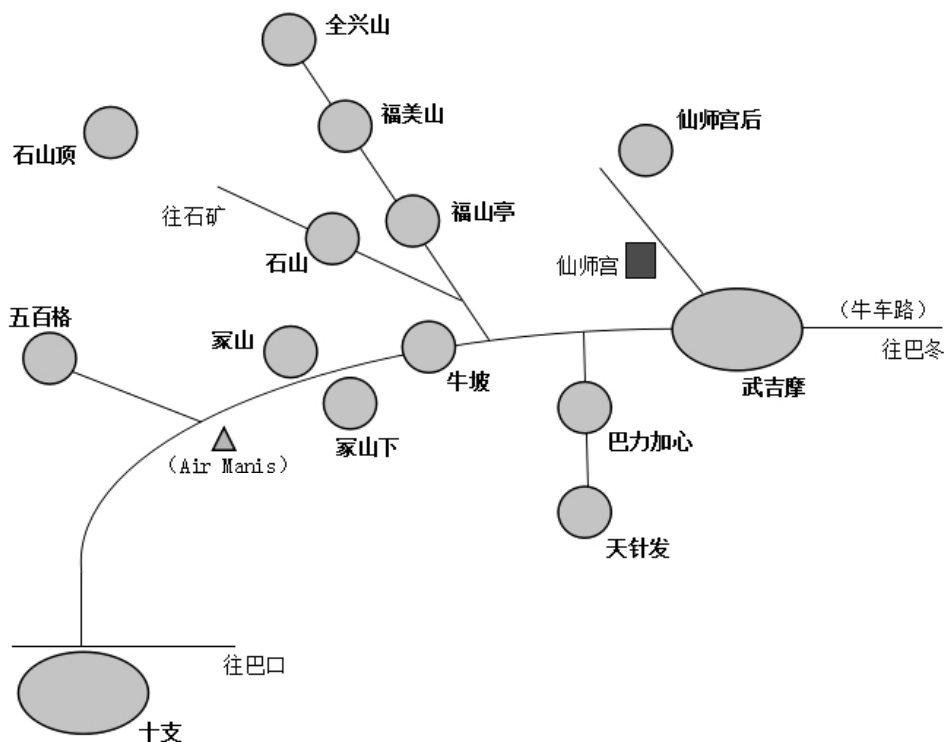


图1：1950年迫迁以前，武吉摩一带主要华人聚落示意图

围起新村前的武吉摩村落华人住户本就很多，同时也有一些马来家庭；另外还有约一百名印度人，主要为当时公共工程局的石矿工人。当1950年围起新村的时候，就是围在武吉摩村落四周；而上述那些村落内的华人则统统都迫迁，有些迁往他地，多数则搬进了新村。目前武吉摩村落的大路，当时是红泥地，村民称“牛车路”；大路往西就是通向巴冬。武吉摩村落有数十户人家，其中牛车路两旁多住着林时家族的成员；此外仙师宫正门外大路的斜对面往里进去就是“华明小学”，大路再往西的右边进去则是苏用军家族的大宅院，根据目前遗址来看，其大宅纵深超过50公尺。苏永军父亲苏金此当初就已是当地的地主望族，牛车路右边一带的土地基本属于其家族的产业。一百年前一块置于巴冬河道武吉摩码头上的石碑，题着三行字：“丁巳年吉立/拜仙师公宫小路直行/苏金此答谢”。这是当年陆路交通畅通之前，巴冬华人往武吉摩，拜仙师宫，尤其到仙师宫后山的义山“老山”埋葬亲人（邱克威，2017）、祭拜先人的主要通道；当时即由巴冬河乘船往东到武吉摩码头上岸，再经此走小路到仙师宫及义山。

根据1929年的柔佛州年度报告，当年一共新开通三十三英里的公路，其中就包括巴冬到亚逸依淡的公路（Parit Jawa – Ayer Hitam Road）。（*Malaya Tribune*, 1930）这里的亚逸依淡指的是武吉摩与巴力士隆（Parit Sulong）之间的村镇，属麻坡辖内；因此这条1929年新开通的公路即包含目前由巴冬至武吉摩与十支的一段。⁸可见石碑所立之1917年，当时巴冬与武吉摩之间的村民往来仍是以巴冬河道为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955年时82岁的Che Yusof bin Ibrahim回忆，大约在1900-1920年左右他在武吉摩石矿山担任消防员，其云：

从这里（注：指巴冬）到武吉摩有一条有轨车道支线，木头车道，并由牛拉着载货车。火车主干道是从这里（注：指巴冬）到麻坡，这是一条铁轨车道，并有蒸汽火车。这是苏丹阿布峇加开通的火车路。1924年当公路开通后，这条火车路就撤掉了。⁹

（George, 1955）

由此便可明白当年村民称这条路为“牛车路”的缘由。这篇报道称当年这是一条木轨车道，且供牛车运载货物的，并非蒸汽火车通行¹⁰；然而，根据一般民间口述，这里曾

⁸ 这里的“Ayer Hitam”绝不是指峇株巴辖内的亚依淡。主要原因是亚依淡至巴冬最近的车道距离为42英里，而报告明指出当年新设公路长度为33英里。因此这只能是麻坡辖内的亚逸依淡。

⁹ 原文为：There was a branch railway from here to Bukit Mor, with wooden rails and wagons drawn by bullocks. The main line was from here to Muar, where they had iron rails and steam engines. It was Sultan Abu Bakar who opened the railway. The railway was scrapped in 1924 when the causeway was opened.

¹⁰ 上述1929年的柔佛年度报告中，也指出麻坡到亚逸依淡一段路是“铺泥土与钢铁加固工程已完成”（earthwork and metaling were completed）（*Malaya Tribune*, 1930），由此可见当时原本就有一条通道，而这时的工程仅仅是完善加固，并使之成为供汽车罗里巴士行驶的公路。这与此前提到牛拉货车的木头车轨的记载也是相吻合的。

是一条火车铁轨，且运行蒸汽火车。比如林意就称其父亲曾说这里当年是火车铁轨，且民间至今仍保留据说为当年武吉摩使用的铁轨残段。¹¹

武吉摩村落作为这一带村落的重要市集，大路两旁的商铺和作坊非常多，从事的行业也很多样。根据口述调查，其中包括酱油厂、洋杂店、布店、赌馆、二间鸦片馆、药店、橡胶厂、二间豆腐店、云吞面店、印度食店；另还有杂货店，店主为黎国；打金店，主要做马来人生意；打石店，主要刻墓碑石，店主为蒋人寿，南安人，营业至1980年代初；树桐厂，制作棺材木板，当初巴冬一带唯一的棺材店在大街警察局附近；此外还有宗教场所，如仙师宫、真空道堂。

此外，华明小学正门口小路的对面，原本是麻坡公共工程局的办公室，目前已经搬迁，留下一大片空地。林意追述：

紧急状态时期以前，工程局的规模很大，设有英国人主管，村内并设华人大工头，当时的华人工头叫梁振。工程局的主要工作为管理石矿的开采及加工与运输，属下的工人很多，村内的一百名印度工人很多都是工程局的；另外还有十几辆大货车，用来载送石头。紧急状态之后，这些大货车都被马共烧毁，甚至连工程局都被马共放火烧了。于是一直围起新村，工程局的规模都缩小很多，只有一个书记和几个工人。到后来就完全撤了。

从住户分布及人数，加上商铺和作坊的数量及种类，可以想见紧急状态之前的武吉摩一带村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都已达到一定规模。

1950年武吉摩设置新村，周围十余个村落的华人都遭迫迁。但并非所有人都移植进新村。有些人就近迁至巴冬，尤其是潮州人；而客家人几乎都搬离当地，多数到附近客家人聚居的城镇如古来、居鑾。因此早期客家锡矿工人及其家属大批搬离，至今巴冬、武吉摩一带已基本没多少客家人。于是原本虽以福建人较多，但仍掺杂各方言群的社区，设置新村后就更集中为福建人的聚居地。

武吉摩新村是将周围村落的所有华人都移植进一个原有聚落中，并以铁丝网围起来进行统一管制。根据1958年马来亚基督教理事会（Malayan Christian Council）所做的调查与分类，这是属于C类型的新村。¹²（Nyce 1973：1-2）

三、新村前后时期的马共活动

英殖民政府在“毕利斯计划”（Brigg's Plan）下在全国各地设置新村，目的就是隔绝马共与一般华人民众的联系，断绝其粮食物资供应，并切断其宣传与招募途径。如前文所述，基于巴冬和武吉摩一带的重要交通枢纽位置，这里一直是马共抗日军的重

¹¹ 武吉摩居民保留的铁轨残段，一般相信即武吉摩火车铁轨；若其如此，轨道于1924年左右拆除，这些文物至今已约一百年。其实不排除其余可能性，首先是巴冬至麻坡的铁轨，其次是开采石矿所使用的铁轨。无论如何，民间口述与早期报道的这个分歧，需要进一步辨析。

¹² Corry（1945：2）的报告也将新村分为三种类型，但其分类是从设置新村的永久性与否为原则，即出于政府管理新村的出发点，而并非新村设施与性质本身的分类；与此处所引的马来亚基督教理事会分类不同。

要活动区域，尤其武吉摩地区山林密集，更是藏身并展开游击战的绝佳地势。到英政府向马共宣战，进入紧急状态时期，武吉摩一带成为马共活跃的地区，甚至在大街上的枪火冲突事件也时有发生。

当地马共成员多为当地人，紧急状态前十支形成抗日军的大本营，设置路障，守卫地方；日本宣布投降后抗日军立即占领巴冬警察局，维持地方秩序。实则日军侵略马来亚之前，麻坡就是南马的“抗日救国”宣传与酬赈中心，由张开川等人领导，其“筹赈成绩，曾蔚成全马风气，而为日政府所注意”（麻坡华侨殉难义烈士编辑委员会1947：21）；因此日军占领麻坡后大批搜捕当地华人领袖，麻坡一带遭屠杀的殉难人名单就列了555人。（麻坡华侨殉难义烈士编辑委员会1947：84-105）

由早期的抗日传统，到与日军抗争，到日军投降前后排华时期保卫华人、调解冲突，以及战后宣传国家独立，至于紧急状态时期与英军的对抗冲突；我们要真实还原武吉摩新村的历史，就不得不先对新村设置前后时期马共在当地的活动做一番全面而详细的梳理。

以下我们分为两大主题进行分述：一是日军投降前后马来人排华事件；二是紧急状态时期马共与政府之间的冲突。

（一）排华事件

1945-1946年间，日军投降前后发生了马来人排华事件，屠杀华人、烧毁房屋，主要地点在柔佛州与霹雳州。当时的排华事件，起因主要是日军报复华人而有意煽动，此外抗日的英军136部队也参与其中企图挑拨殖民地的民族对立，达到其分而治之的目的。（陈正华 2012：16-17；阿都拉西迪 2010：88，92-93；张佐 2000：214）此外，这场排华冲突中的主体实际上是马来人中的万惹族（Banjar），虽然其余马来人族群也有参与其内，但他们有不少是保持中立，有些甚至主动帮助华人。如陈正华（2012：85-86）称：“整个事情的发生与结束，华巫两族，也体现出许多好人好事，华人能够逃出马来村落，也因为村落的马来人，多数是爪哇族，通风报信及协助逃跑，才能保住性命。”

柔佛州的峇株巴辖是全国第一宗排华事件的地点。（阿都拉西迪 2010：151-152）由当地蔓延开，南向龙引、文律一带，北上则杀向麻坡。对于北上这支手持巴冷刀追杀华人的队伍，后来成为马共主席的阿都拉西迪（2010：152）做过这样的记述：

在峇株巴辖被屠杀的华人群众，向巴力爪哇逃亡，寻求人民抗日军的庇护，巴冷刀队则在后面紧紧追来，为了保卫群众的安全，和制止更大流血冲突，人民抗日军便是一条小河布防，并规劝那些巴冷刀队停止前进，不要进行屠杀。抗日军说明：马来人和华人不是敌人，真正的敌人是日本。但是，由于在日本的煽动下，他们中毒很深，对抗日军的规劝听不入耳，径直向布防的抗日军冲杀，威胁到战士的人身安全，因此抗日军被迫开枪射击，迫使巴冷刀队后撤。

根据各方文献的记载与口述采访所得，这支排华队伍在巴冬地区受到重创¹³，并最终由抗日军的斡旋终于调解了冲突；否则不论是排华事件加剧，或是华人采取报复行动，演变为全面性的民族冲突，后果将不堪设想。不论如何，巴冬一带华人遭受的伤亡损失惨重。其中死伤人数最多的是巴冬南面通往峇株巴辖大路上的红桥（Seri Menanti）、武吉摩东面的五百格与石矿山山顶的华人村落。这些地方的房屋几乎都烧毁，红桥如今重建后规模颇大的地标式神庙“复兴宫”，当年同样遭烧毁。

据1947年初麻坡中华总商会主席刘国七¹⁴提呈的《麻坡损失调查之结果》称：

去年土人大屠华侨时，于七月一日成立之麻坡救济难民委员会救济金（伪币）四十万余元。至个人受刑，惨酷异常，何殊人间地狱。统计凡五十一名。（麻坡15华团 2005：54）

此外，郑昭贤（2009）另还征引“《麻坡华侨被害损失》报告，在麻属巴力爪哇（巴冬）地区，华人房屋遭焚毁者共有856间华人房屋遭焚毁。实际数目会更多，因为这是呈报的书面表格报告数字，口头报告不算在内。”¹⁵

关于巴冬华人打退排华队伍的一战，徐国良、徐清爽兄弟曾亲历其事，并做了详尽的口述。徐国良当年9岁，其云：

1945年，日本刚投降，麻坡日军未撤退。抗日军已占领巴冬警局。当年永春会馆原址旁边，即今约巴冬大街巴刹的位置，有一条木板小桥跨过巴冬河，当时是杀猪场；当年的巴刹原址在现址的马路对面。这条木板桥是方便人们将宰杀的猪送过河到巴刹去卖。某日早上，传来消息人数众多的马来人杀入巴冬从河对岸要渡过木板桥，奔向马路对面的回教堂，即今杉岭公会后面。巴冬华人早前听闻峇株巴辖一带发生排华，且队伍已经北上麻坡，所以事先已有准备。于是一群华人带着长矛，尤其潮州渔夫身体健壮，以及许多练就一身武艺的巴冬华人，等在木板桥头。马来人身着黑衣，系着红带，手持巴冷刀。双方在桥头发生冲突，长矛刺死一些马来人。马

¹³ 根据巴冬居民的口述，南面杀来的万惹人在巴冬受阻而未北上麻坡。然而根据阿都拉西迪（2010：153-154）记述，1945年峇株巴辖县长“拿督翁立刻动员三千人的巴冷刀队，举着火把，挥舞着巴冷刀，渡过麻坡河来向华人乡村和人民抗日军发动进攻。”但这与其前述峇株巴辖“全国第一宗排华事件”并杀向巴冬的情形不同，似应是另一拨的进攻。

¹⁴ 由麻坡15华团编印的《麻坡华人的血泪史》（2005）将名字写作“刘国土”，但经查阅却无此人资料。另一方面，刘国七早在1937年就是麻坡永春会馆与林彬卿、郑文炳等人共同发起“救济祖国难民会”的华社领袖人物，同时也是战后1946年成立“麻坡华侨集体鸣冤委员会”的委员。因此，该书中“刘国土”应是“刘国七”之误。

¹⁵ 郑昭贤（2009）所引报告，即刘国七《麻坡损失调查之结果》的统计表。至于“房屋遭焚毁者”，其统计表云：“巴力爪哇区房屋之为口口人所焚毁者计有……。又在巴力爪哇为日人焚毁者一间，共计八百五十六间，截至十月九日止，向荷纳少将报告者共有一千六百七十间。上列数目较少者，因口头报告，不算在内也。”原报告“巴力爪哇区房屋之为口口人所焚毁者”中缺二字，但不论如何，这个856间里有一间是“为日人焚毁者”，更何况正如郑昭贤称“实际数目会更多”，这个数字是非常保守的估算。

来人心里有点害怕。这时天空一阵浓云密集，天色变化，巴冬人们相信是清水祖师显灵庇佑华人。于是马来人也吓得后退。

当年巴刹附近的这一战，如今86岁的巴冬居民李仕源就曾亲见；根据其口述，万惹人和巴冬渔民在桥上对打，渔民长矛刺死的万惹人掉进河里，当时村民将死去的万惹人埋在永春会馆前的一棵大树下，后来才移走的。再如当年7岁的林忠义也做了相关论述，其云：

日军煽动万惹人屠杀华人。在巴冬，主要是潮州渔夫组成保卫队，在河边奋起抵抗，以长矛刺杀万惹人52人，最终阻止万惹人继续北上麻坡。万惹人手持巴冷刀，手段非常残忍，我曾亲见被割掉双耳的受害者。万惹人腹部衣服内藏有铁板，潮州渔夫初时长矛刺不穿，以为有降头，便用狗血洒在矛尖，后来因由侧腹刺死万惹人，才知道是前腹藏铁板。此外从刺死的万惹人身上都发现带着一包饭加三只虾，据说是原本打算杀过巴冬一路北上麻坡停驻的粮食。事后巴冬华人曾策划报复行动，准备了火水及麻袋，打算烧附近的马来人住屋，后因马共抗日军到来阻止。

此外，2001年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一次巴冬历史口述记录中，也有多人谈及巴刹附近的这场战役，如口述时93岁的陈秀典谈及：

日据末期，有一次，由于日军的煽动，马来人从峇株巴辖杀下来巴冬。杀到巴刹来时，正好是华人正月十五，两百多个捉鱼人对抗六百到七百名马来人，有人伤亡。……日据末期的排华事件，清水祖师曾经显灵。在清水祖师的庇佑下，巴冬的华人在巴刹和马来人进行了对峙，最后成功的击退了马来人的攻击。

（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 2003：296-297）

又如谢隆兴（94岁）、郭鸿杰（89岁）的口述记录也有类似内容：

在日据末期，由于日军的煽动，有排华事件。当时肇事者从峇株巴辖的新加兰、四加亭一路杀上来。到巴冬时，在巴刹后面，也就是在永春会馆的前面，捕鱼的华人犹如神助（翠美古庙的清水祖师相助），英勇抵抗（华人只死了一个），才把乱事平息。不然，如果北上的话，麻坡市就完了。

（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 2003：298）

由此可见当年巴刹的那场战役在村民中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只是上述陈秀典将排华冲突时间记为“正月十五”，即1945年2月27日；这远远早于各方记录所述日军煽动万惹族排华的时段，值得商榷。

上述多人都谈到了翠美古庙清水祖师庇佑村民的情节，类似故事在巴冬一带流传很多。比如现任古庙理事会副主席陈荣辉就说：

巴冬民间都流传，当年万惹人曾杀到靠近巴冬村口的地方，正要进村里；华人则准备迎战。突然万惹人看到村内站着一群身着白衣，手里拿着武器的人排成一列，自己吓得后退，不敢进村。大家都相信是清水祖师派天兵天将来守村子。

万惹人杀来当天，徐国良兄弟的父亲徐守强听说排华队伍杀来，赶紧带着全家逃至巴力峇九（Parit Bakar）。对当时的情景，其云：

当天早上逃往巴力峇九，到了之后看着没事，下午就开始回巴冬。当天正值麻坡的日军撤离，两辆大军车从麻坡开往峇株巴辖方向，最终到新山再往新加坡，大队会合后遣回日本。当天约傍晚时候经过巴冬，军车驶过警局门前的十字路口，驻守警局的抗日军见到蠢蠢欲动，但自忖日军武器精良，自身的普通猎枪敌不过。但军车驶过后，还是向其车尾开枪，其中一枪射在电线柱上，留下几个子弹孔。日军并未中枪。然而此时军车突然掉回头，进行报复；抗日军则撤退至十支与大队会合。日军接着将警局门前十字路口往峇株巴辖方向大路两旁的两排店屋全都放火烧尽。我们一家人傍晚从巴力峇九回巴冬，远远就看到火光冲天，不敢再前行；于是转向十支。在十支过了一夜，第二天再转至巴口暂时避难。

峇株巴辖逃来的华人带着排华队伍杀往巴冬的消息，许多村民听了也纷纷出逃。武吉摩周边的华人逃向巴口（Bakri），而巴冬一带华人则逃向巴力峇九；比如巴冬村民蔡明月的母亲当年就是带着孩子们逃往巴力峇九避难。现年92岁的张亚娘是巴冬渔村最早一批潮州人住户，她对当年逃难的慌乱景象还历历在目，最刻骨铭心的是这一段惨绝人寰的记述：

村民乘船逃难，当时夜里，河岸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婴儿请求上船。船上的村民担心婴儿啼哭招来万惹人，于是对妇人说不能让她抱着婴儿上船。妇人央求再三，最终无奈，把心一横将婴儿投入河中，自己上船逃生。一路上啜泣不停，但又不敢出声；船上村民也不胜悲恸。

当年家住武吉摩附近牛坡村落的苏江河，那时7岁，父亲带着一家连夜出逃，其云：

牛坡并未遭到杀戮。但当天父母听闻万惹人杀到巴冬，连夜全家逃往巴口。半夜开始收拾家当、拉着脚车，一路步行，约凌晨四点半到巴口的“育华园”橡胶园亲戚家。中途在十支被马共抗日军设置的路障拦阻，喝问口令，父亲告知是逃难的，于是抗日军放行。过了一夜全家都平安回到牛坡住家。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上述徐国良、徐清爽兄弟一家原本住在巴力咯隆隆（Parit Kedondong），早前听说峇株巴辖方向有万惹族杀华人，父亲为了家人安全，就搬到巴冬华育学校旁边的自家住宅；在万惹人排华大队杀来之前的某日，父亲曾回巴力咯隆隆的家里查看情况。其云：

父亲想回巴力咯隆隆查看情况。但不免担心，于是询问当地的彭古鲁（Pengulu，马来领袖），彭古鲁说应该没问题；父亲才大着胆子骑脚车回村子去。当时很多人都劝他别回去。到了村里，发现原本熟悉的马来邻居们神情异样，见了都不打招呼，躲起来偷偷看着。父亲心里警惕，赶紧奔进家门，只拿了一根铁秤杆和一个永春特产的漆篮，篮子装满日用品及粮食就立即离开。事后才得知，当时村里马来人见到华人进村，急忙跑向村里的回教堂，请示祭司是否要斩杀；得到指示后正带着一帮人挥舞巴冷刀杀来。这时父亲已经离开。父亲在离开村子的路上，碰见自己的三弟媳正打算进村。父亲告知村内的情形，劝她一同离开，千万不可以进村子。这位我们的三婶后来活到一百零四岁高龄。

当然也有村内马来人保护华人的事迹。比如林意当年家住巴力加心，其云：

巴力加心由于华巫关系和谐，未受到万惹人攻击。当地马来人多受祖父林时雇佣，为其橡胶园的割胶工人。祖父待其宽厚，因此彼此关系融洽。排华事件期间，村内马来人自主组织卫队，因此整个村子的华人村民都未受到攻击。

当年麻坡区抗日军领导林其辉曾提到，进攻麻坡方向的万惹族根据地在巴力士隆，其首领称作阿里沙礼（郑昭贤，2009）。按照峇株巴辖方向北上麻坡，以及巴力士隆的地理位置上看，可以理解灾情最严重的华人村落多集中于巴冬南面与东南面，如红桥、五百格等地。此外，根据巴冬与武吉摩居民口述，当年他们逃亡路线也是朝北面或东北面：巴冬华人主要逃向巴力峇九，而武吉摩一带华人则逃向巴口。值得注意的是，排华队伍非常明显有意避开沿着大路最直接的取道十支，那里聚居较多华人，且可由那里北上巴口，东向武吉摩与巴冬；何况沿途散处的华人村落也较多；也正因此十支与巴口周边华人村落都未受到排华事件的影响。目前分析排华队伍绕开十支的最直接原因，应是当时十支驻有大队抗日军；此外也许还因为其进攻取道多为马来村镇地区，不排除其沿途招募扩大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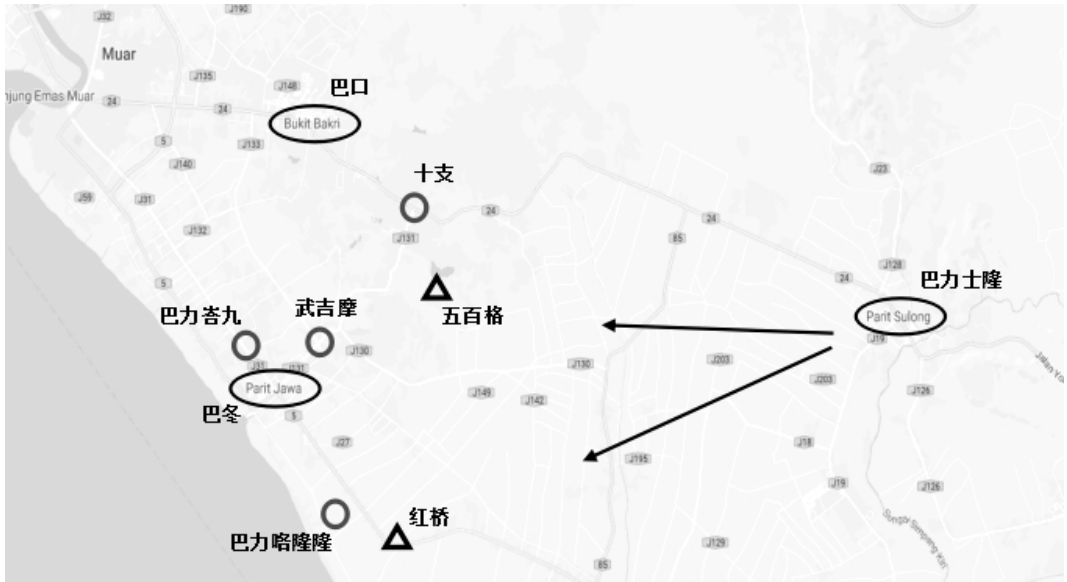


图2：日军投降前后排华队伍进攻巴冬的地理位置示意图

根据阿都拉西迪与徐氏兄弟等的各方记述，万惹族进攻巴冬与武吉摩地区应该不仅一次。郑昭贤（2009）讲述林其辉领导的麻坡抗日军调解这场民族冲突，称“1945年5月”；然则武吉摩仙师宫后义山的一座“义士墓”却向我们显示排华事件至少演至8月下旬。李永球（2017）曾记述云：

还有一个义士墓，乃潮州揭阳凤美乡人陈俊清，殉难于民国卅四年七月十五日（1945年8月22日），由中华公会立碑。相信背后一定有段悲戚动人的故事。

这位殉难于1945年8月22日的陈俊清，根据谢岳逢口述，即排华事件中遭万惹族杀害，其云：

陈俊清为巴冬中华国术协进社成员，当时从中国南来，自恃武艺高强、胆识过人，为人好勇。当天喝了些酒，趁着酒气，正好万惹人杀来，在大街上对峙中大家略后退，陈俊清一人奋身上前，遭万惹人开枪中弹身亡。他只身南来，无亲属，于是中华公会为其立墓碑。原本墓碑立于殉难地点，后来才移至义山。¹⁶

¹⁶ 排华队伍的武器基本都为巴冷刀。然而根据陈正华（2010）的口述调查以及林其辉的记述（郑昭贤，2009），也能看见他们偶尔也带枪。

巴冬和武吉摩一带在这场排华事件中殉难人数，根据刘国七报告的统计为五十一人，房屋焚毁至少八百五十余间（麻坡15华团 2005：54-55）；过程中个人及家庭所受到的心灵与精神磨难更是难以估算。根据多人口述，巴冬华人曾经组织报复行动，所幸抗日军前来劝阻；类似情况在陈正华（2012）调查的霹雳州也多有，如其记录冷甲（Langkap）地区情况云：

华人众情沸腾，尤其是有亲属被屠杀的家属，情绪非常激动，喊打喊杀，高喊要报仇，要杀死被扣押的排华嫌疑份子，……。人民抗日军首领要大家安静，冷静，向众人做出分析，如果处死被扣押嫌疑排华的马来人，这将会引发他们的孩子们攻打华人市镇进行报复，然后华人又进入村落攻击马来人，这样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因此建议释放全部被扣押的马来人，让他们回去，劝解村落的马来人，停止屠杀华人的举动。

（陈正华 2012: 36-37）

至于巴冬地区的冲突，麻坡区抗日军领导林其辉曾口述其智擒巴力士隆的万惹人领袖阿里沙礼，软硬兼施使其和解，并得拿督翁（Dato Onn bin Jaafar）出席会议签署和约。（郑昭贤，2009）

至今巴冬和武吉摩的华人讲起排华事件的这段历史，仍然感激抗日军的功不可没。

（二）马共冲突

日军投降后，马共抗日军立即占领巴冬警察局，维持地方秩序；同时在十支建立大本营，设置路障。有些受访者指出，当时巴冬地区的马共抗日军领导姓黄，正是他带领马共在日军投降后占领巴冬警察局，并且这位黄姓领导在后来紧急状态时期围起新村后的一次枪击战中，遭到英军的炸弹击中身亡；死后英军将其尸体吊起来威慑新村华人。

当地华人印象最突出的一位马共领导人叫“锦团”，均只记得其名字带“锦”而忘其姓氏。¹⁷他是当时武吉摩的马共区委书记。苏江河小时候曾见过他；因其刚从中国南来就寄住在牛坡他的家里，后来才搬到天针发村落。苏江河形容其样貌：身材并不高，约四、五尺，圆脸，强悍干练，手段狠辣。其云：

日军投降后，抗日军在十支，领导是锦团。他在十支派传单向民众募捐，但民众不交，甚至有人报官，锦团就将那人抓了绑于路口杀死，于是民众自己上门缴捐。紧急状态时期，马共转入地下，他对于怀疑涉嫌出卖马共

¹⁷ 受访人中林意依稀认为“锦团”姓黄，但不敢确定，其余人则都想不起来。然而，前述占领巴冬警局的马共领导人正好姓黄，但受访者均忘其名字。此外，林意还补充说“锦团”死后就是被吊起尸体展示，而且另有一位马共领导叫“红脚”（ang-ka）是被英军的炸弹炸死的。由此来看，这些论述中至少涉及二个马共的领导人；当然也可能是三个不同的人。口述的资料涉及几种可能性：一、林意将“锦团”与黄姓领导混同；二、另外受访人将黄姓领导与“红脚”的死因混同；三、这三人本就是三个不同的马共领导人。其中比较纠结的当然是“锦团”与黄姓领导人是否为一。由于缺乏进一步证据，本文暂将其作为二人分述。

情报者必严惩；而且还曾在华明学校杀人。他还曾策划杀武吉摩新村村长林孝铭，并二度派人在其仙师宫后的橡胶园里埋伏等候，恰巧那两次林孝铭都因事未进园里巡视，得免于难。林孝铭事后听人说起捏了一把冷汗。

林意补充云：

锦团因怀疑巴力加心村民林波出卖马共情报，派人捕捉林波，后其妻跪求我父亲林友成向马共交涉救人。林波获得释放，但父亲也因此受政治部拘捕送监。1949-1950年初，锦团妻子与女儿居住于永春义山对面的“冢山下”，被政治部突击拘捕，妻子遭遣返中国，女儿约十五六岁逃脱，后来随父亲加入马共走进森林。锦团怀疑是新村自卫队林合提供情报。于是连同李狗头、李宽良埋伏于通往巴冬的大路旁，约今Jalan Sri Tanjung路口处；当时大路两旁均为树林。林合、郑金针、施东梁三位自卫队员前后巡行，走到埋伏地附近，锦团等开枪射击，林合中枪毙命、郑金针中枪倒地但仍开枪驳火反击、施东梁走在后头见势就地滚入路边水沟，逃过一劫。因枪击惊动周围，锦团等赶紧逃走。后来郑金针送入医院三天后逝世，葬礼非常隆重，县议会都出席。

从各方记述来看，锦团做事确实很强悍；但这也使其招来杀身之祸。林忠义云：

大约是1950年代初期，在围起新村之前，有一回锦团与另一人在巴力林蒙（Parit Limbong）大路放火烧工程局的巴士。不料车上载着警员，双方展开枪击战。锦团仅二人，难敌人数较多的警员，驳火中锦团小腿遭子弹射穿，逃至今仙师宫一带大路旁的高压电线杆处，终因伤重跑不动，于是开枪射脑部自杀。另一人也在枪击战中阵亡。

根据林意的补充，锦团死后被英军将尸体吊起来展示，以威慑村民。

锦团死后，继任武吉摩马共区委书记的叫傅良德，人称“红脚”。据林意口述：

傅良德接任武吉摩马共区委书记，人称“红脚”。他是麻坡人，家住麻坡三角铺，家里原来做收购香蕉等土产生意；后来生意由其弟弟继承。“红脚”后来被英军的炸弹炸死，应该是围新村前的一次英军轰炸中被炸死的。

除了锦团上述的几件震撼的冲突事件外，包括烧公共工程局及其货车等事，这些基本上都发生于围起新村以前，而马共在武吉摩围起新村之后似乎就没有发动其他较大的攻击行动。可见锦团作为领导人确实是个厉害角色。另有一位也是马共领导级的强悍人物，人们叫他Kau-liau（闽南话意即“九指”）。因其一手损失一根手指，故称“九指”。解除“黑区”后的某年，人们在橡胶园里发现一副骸骨，由其九根手指

的特征推测即Kau-liau。估计他也许也是紧急状态初期就死去，只是死因不明。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即武吉摩马共区委的最末一位领导林克明。1960年林克明带着支队十二人走出森林投降，结束抗争。关于林克明的事迹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后来回到中国，落户于华侨农场。根据林意转述：

据知情人口述¹⁸，1960年林克明是武吉摩支队的领导，当时森林里经常断粮，有时甚至十来天未进食。由于何浪投降事件影响，支队本想北上但却断了联系。再加上当时在柔佛仍与之互通声气的古来马共支队也在1959年自行解散¹⁹，于是1960年林克明带着支队十二人，先将枪械埋藏好，走出森林投降，然后再带着军警上山去挖枪械。林克明后来回中国，安置在华侨农场中。

紧急状态初期，马共成员大约是三十至四十人，直至1960年由林克明带领走出森林投降，人数则是十二人。实则在紧急状态之前，马共在武吉摩一带非常的活跃。最主要的活动之一就是每日挨家挨户敲门进行国家独立的宣传。苏江河还记得小时候在牛坡的住家每日都有马共成员来敲门，然后进行关于争取独立的宣传讲解。到了紧急状态初期，还未围起新村之前，马共虽然转入地下，但仍是经常在各个村落内活动。他们主要是敲门向村民讨食物；村民一般自己物资也很匮乏，但通常都会给些食物。政府经常派人巡逻检查，村民害怕受到怀疑，一般早早地五六点钟就紧闭大门。即使围起新村之后，马共在新村内仍布置了收捐员。比如林意口述：

由于父亲从马共手里解救族亲林波，结果遭英政府怀疑而被捕，因此迫迁入新村后，母亲一人带着十一个孩子租住屋子。这时有个族叔林坤来借住，母亲一来好心，同时也考虑到家里有个成年男人较方便，就让他住下。这位坤叔平时话不多，一人睡楼下；经常出门，好像也没见他做什么工作。一住几十年。直到他死后，近年才听人说起当年他就是马共在新村里的收捐员，按月在村内收取月捐。想想当时真的一点点都没有察觉。

紧急状态时期马共的活动很谨慎，对英军的行动也充分掌握。苏江河就记述：

有时英军在大路家家户户检查，马共则在后巷敲村民后门。他们通常白天就藏身在橡胶园中，三两人一伙，主要是休息。他们穿着便装腰间插着割胶刀，遇到军警来巡逻或搜芭，就冒充割胶工人，假装做些割胶动作。

¹⁸ 这位受访人由于各种考量，不愿透露身份，但出于历史记录的意义，同意我们将口述资料记载下来。

¹⁹ 根据受访者口述，当时另有古来的支队，与武吉摩支队相互联系。古来支队的领导是位女性。由于断了各方的联系，这两个支队先后于1959年与1960年解散。先是1959年，古来支队自行解散，成员将其枪械埋藏好，各自走出森林，停止抗争，散入社会民间，并未正式向政府投降。其后则是1960年林克明带着武吉摩支队出来投降。

白天去园里割胶，经常会看到他们；他们不会妨碍割胶工作，彼此也不交谈，互不干涉。那时候英军经常会雇佣卡兵（Gurkha）和斐济兵（Fiji），带着狗进山搜查。曾经有村民因回避不及被当作马共遭逮捕。这种时候，躲在胶园内的马共往往会预先警觉并告知割胶工人说附近有军警，以免他们受惊吓甚至被怀疑。这样的情况在围起新村后也还是一样。

从紧急状态初期开始，英军就经常在武吉摩一带进行搜索，甚至是飞机投弹轰炸。马共在十支的大本营就遭到严重炸毁，整个村落市集都夷为平地，至今了无痕迹。

新村计划隔绝马共与村民的联系，确实在对抗马共上起到了作用。自从围起新村后，马共在地方的对抗斗争上就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至多也仅仅是骚扰英军而已；其中估计强悍领导人锦团的阵亡应是个重要因素。林意回忆云：

每周几次夜里都会听到村外发生马共和英军的驳火。但由于保安队及雇佣兵人数众多，武器精良，马共基本进不到新村内来。即使村外的驳火，其实也并非真正的枪击战。多数是马共在山林间点起火，让英军误以为是敌人便开枪射击，目的在吓唬英军并消耗其火力。当时主要驳火点集中在东面与东南面，即往十支和往巴力士隆方向的村外山林间；通往巴冬方向就很少。

然而真正的驳火还是有的，有时候马共甚至会在村外开枪射向村内。苏江河当时家住东边围篱在大路南面的第一间屋子，距离铁丝网围篱不到一百公尺。他就曾记述说，某天夜里马共在东边的山上架起枪向村内的保安队射击，其中一枪就打在他住家的屋顶上。

新村内的居民进出新村都受到严格搜查，而各种生活物资尤其是粮食都受限量管制；同时政府还不时展开突击搜查，以及检举行动。如此监管和恐吓，加上各种宣传手段，有效地限制了马共的活动。当然马共借助对当地地形的熟悉，以及行踪不定的游击战术，在对抗中也未蒙受致命性打击。但如此僵持，也难有作为。1958年，由于马共中央南马局书记何浪投降事件影响，武吉摩的马共支队断了组织上的联系，于是1960年由林克明带着十二人出来投降。

从宣布紧急状态始至1960年结束抗争，这一支由近四十人减至十二人的马共支队，在极度物资及各方条件匮乏的环境下，在周边山林间游走抗争了十余年；尤其是后期的日子，据口述有时甚至断粮十来天，何况还断了组织的联系。

四、新村围篱设置及其概况

1950年，英政府下令迫迁武吉摩周边村落中的所有华人，并在武吉摩原有的村落四周设置铁丝网围篱，形成武吉摩新村；这些华人基于工作及产业的考量有不少都搬进新村。设置新村的初期，村内约有一百余户华人家庭，此外另有五六户原本居住村内

的马来家庭。²⁰正如上文所述，有些村落的村民迫迁后并未搬进新村，而是选择迁往他处，如就近的巴冬；而客家人则基本迁往古来或居銮。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村落的马来人仍允许居住在原地。而华人迫迁之后原房屋的基本处理方式即将之焚毁，比如牛坡、石山顶等地。但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巴力加心的华人房屋，则下令租借给当地的马来村民。

根据林廷辉与宋婉莹（2002：11）的总结，英政府搬迁华人家庭推行新村计划的措施主要有三种：（a）武装强迫搬迁；（b）给予搬迁重建住家费用；（c）与华人政党马华公会合作迁移垦耕者。在武吉摩新村，第一种方式是基本手段，比如巴力加心就是；然而也有第二种方式的，如牛坡原村民苏江河就记述：

宣布紧急状态之后，由于地方上不安宁，父亲就带着全家搬到巴冬，原本住在车头一带。后来武吉摩围起新村，英政府迫迁村民，听说我们村里给补贴。只要搬进新村，建一栋房子就给补贴90块，但原来的屋子就烧掉。当时我们原来的屋子还在，于是父亲赶紧回去领补贴。在新村里向一个马来人买了一块地。因为地处新村东边围篱的边缘，没有人要，所以1/4英亩的地只花了五百块。这块地在大路边，屋子建起来后大门正对着东边出口走道的铁丝网围篱，因此我们出入家门都得从后门绕出来大路。原地主马来人叫Ah-Sing，就住在我们家后面；我们家旁边的地也属于他的资产，目前由其女儿经营食档。

类似给补贴的情况似乎不多，比如林意追忆当年母亲带着全家被迫迁，未有补贴，他们只能在新村内租房子。此外，目前并未发现有马华公会合作或者协助村民搬迁的情况。

此外，1954年英殖民政府进行了第一次新村普查工作，并提交给当时英政府马来亚联合邦最高专员Donald MacGillivray一份总结报告书，其中关于新村村民耕种地需求与分配工作的管理制度，将村民分为三类，并按需规划耕种地的配给；报告明确提出除了地主与自耕农，其余在种植园或矿地工作的受薪者，其生活受设置新村影响的，每户家庭将获半英亩耕地：

政府对此的总应对方针是按照受薪者家庭每户分配或者安置半英亩土地的方式进行，这不包括自耕农。（Corry 1954：4）²¹

按照调查报告，柔佛州内的新村所需分配村民的耕种地一共为8,440英亩，所需款项为\$749,100；而截至1954年10月份则已购置5,940英亩。比较全国各州属的所需耕种地面

²⁰ 林廷辉与宋婉莹（2002：148）：“全国452个新村的成立年份及人口进展”列表中，“武吉摩”的成立年人口数据从缺。按照口述资料所得，以平均“五口之家”的原则推测，当时人口应在600人左右。

²¹ 原文为：Government's genealised answer to this problem has been to provide and set aside land at the rate of ½ acre per family of wage-earners, who are not full-time farmers.

积，柔佛州排第三，而其购置土地所需款项则排第四；但1953-1954年柔佛州的实际拨款来看——1953年为\$592,609、1954年为\$772,449，则占了这两年内全国新村购置土地拨款的近半数。（Corry 1954: 4-6、51）

由此可见，柔佛州内的新村村民在生活物资条件上应该是获得基本照顾的。回过头来看，武吉摩新村的村民基本为种植园员工与矿地工人，应符合报告中的“受薪者”（wage-earners）一类，但根据调查了解，村民基本未获得任何政府分配耕种地。²²

结合上述建房补贴与耕地分配情况，似乎政府有一套用意为鼓励村民迁入新村的福利政策，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未必完全落实。Corry（1954: 23-26）的报告从另一个侧面也能看出落实政策上的巨大落差；比如从申请耕种地地契的情况来看，1954年初全国新村供分配的耕地总面积为47,800英亩，然而接获的申请仅4,300份，而实际批准的更是只有1,570份，占总面积2,900英亩。这仅仅是应分配耕地的6%。²³当然，报告中将这个巨大数据落差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新村村民的主观因素，然而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土地局（Land Office）工作效率上的不足。如其云：（Corry 1954: 24）

各地土地局在处理各种土地申请的工作进度太慢。²⁴

很不幸的，土地局处理申请的工作机制并未有效的运作。²⁵

关于新村的行政管理架构，Corry（1954: 38）的报告还指出柔佛州的新村在设置地方议会的比例上远远超过其余州属，即88个新村中有68个设置了地方议会。另外还提及麻坡县内的新村正在商讨将原有村委会更改为地方议会。（Corry 1954: 39）²⁶根据调查与资料显示，武吉摩新村时期并未设立地方议会，而作为新村管理架构，则有一位众人推举的村长——林孝铭。（《星洲日报》，2014）

（一）围篱设置

武吉摩新村的范围，根据调查资料所得，沿着大路横向约500公尺，纵向则250公尺以上；周围的铁丝网围篱为前后二层，高约2.5公尺；外边一层的底部均有斜向外的一层倒刺铁丝网，其外又有一圈螺旋倒刺铁丝网（concertina barbed wire），以防止人靠近围篱。

²² 当然，报告中还提到比如麻坡等地区的新村，由于所设置的新村房屋土地面积较大（120尺 * 60尺），已基本符合半英亩耕种地的条件，因此不另外分配耕种地。（Corry 1954: 5）然而根据了解，武吉摩新村的新村并未获得政府分配住房，更不论分配建房子的土地。

²³ 这是申请永久地契的数据，其中包括原有地主或自耕农将无合法地契的耕地转为合法耕地；但按照报告中的各方数据显示，其应分配耕种地绝大部分是计划分配给“受薪者”一类的耕种地。因此，这个数据基本能够反映设置新村时政府给村民分配耕种地的基本情况。此外，报告中还特别注明以上数据的申请人数不包括霹雳州。（Corry 1954: 24）

²⁴ 原文为：Land offices are too slow in dealing with every kind of application for land.

²⁵ 原文为：Unfortunately the Land Office machinery for dealing with applications is not working efficiently.

²⁶ 原文为：In the District of Muar there is talk of turning some of the Mukims into Local Council Areas, thus cloaking the old Mukim Councils with legal authority.

新村的围篱整体略呈椭圆形，但在仙师宫处有个转折，将仙师宫圈在新村外。实则，仙师宫作为武吉摩华人村民近百年来最重要的宗教场所，竟然刻意地围在新村的范围外；这让村民祈神上香都极不方便。然而究其原因，最可能就是因为仙师宫是依山而建的，其背面依附于后面的一座义山；若是将其圈在新村内，则围起铁丝网会加大难度，同时也会直接影响地方治安以及隔绝马共的效果。

新村的出入口一共设置四个；每个出入口都有一条长约40公尺、宽约6公尺的走道；走道两边均围起铁丝网；通向村内走道的尽头为一道两扇的铁栅门，同时都各设置一个哨站，村民称做“堡垒”。铁栅门的开放时间有限制，即上午六时开门，傍晚五时关门。村民进出铁栅门都要遵守这个门禁时间限制。

堡垒各高约1.2公尺，四方形，各边长约3公尺，为双层木板，中夹沙包，厚度约50公分，可以防子弹；其上有锌板的尖形屋顶。堡垒内有二名新村自卫队员荷枪把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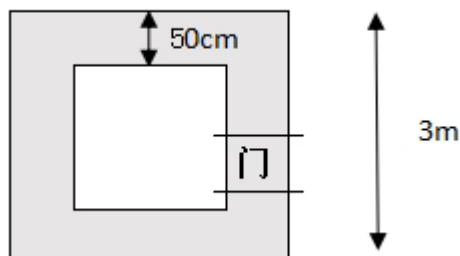


图3：武吉摩新村设置于各出入口走到尽头的堡垒示意图

紧急状态初期，政府就已在武吉摩组织华人村民形成自卫队，负责村内的巡逻治安工作。设置新村之后，加上堡垒的守卫工作需要，新村自卫队人数约数十人；当时规定所有村民壮丁都强制性加入新村自卫队。新村的治安组织管理结构为村长在上，新村自卫队则归其辖内。当时村长为林孝铭，自卫队则分大队长、小队长；大队长为邱分，小队长为陈彪。除此以外，还有政府正规军组成的保安队。新村内常驻的保安队一共十二人，全是马来人；另外还会有驻扎在附近的政府正规军人与英军雇佣兵经常在新村四周的山林间搜查，甚至于进村内展开突击搜查。

自卫队的武装很简单，仅个别人得发配很简单的枪械；训练也不太正规。陈彪太太记述：

自卫队仅大小队长以及个别获得信任的配有枪械，一般是山猪枪或短枪；其余人则仅值班时才配枪，即大家轮流持枪。初时队员仅仅是在村内接受很简单的射击训练，到后期个别获得信任者有机会接受英军的短期正规训练。而且还配有制服。陈彪就曾经被选中接受英军的训练。

林意补充说：

保安队属于常规军人，都是马来人。武装配备较精良，都配有机关枪。每天约上午八点出新村在周边巡逻。保安队会所就在大路通向华明小学马路口边上，即今邱分住家。保安队有时也会配合英军或雇卡兵和斐济兵的搜芭行动。保安队员个个都配有军粮。军粮相当丰富。

自卫队员守卫堡垒的工作，包括守夜工作，基本上是每人一周轮一次。若按照四座堡垒，每座堡垒二人，则新村自卫队人数大约在六十人左右。

至于新村的四个出入口及四座堡垒的具体位置，分述如下。沿着大路横向两端各一个：（1）偏西一个通巴冬，靠近今Jalan Sri Tanjung处，堡垒则设于今李钦家门口处；（2）偏东一个通十支，在大路转角处的今政府诊所位置，堡垒则设于苏江河家隔壁，今马来食档前的电线杆处。纵向近仙师宫处的大路两边各一个：（3）仙师宫一面的堡垒设于今戏台后头，围篱则在距离约40公尺处；（4）大路对面的一个堡垒设于华明小学门口附近，走道则延着小道至目前的小桥边，围篱就设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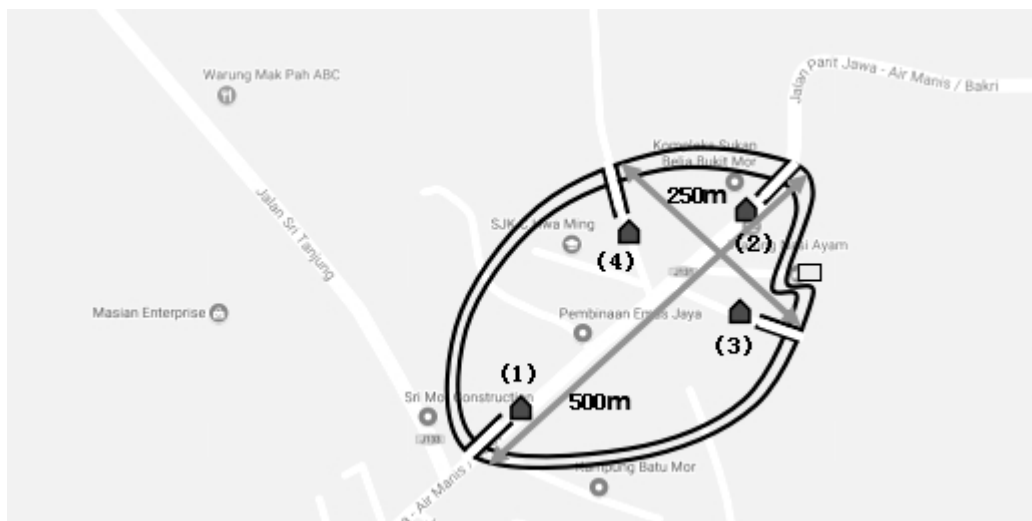


图4：武吉摩新村范围及地理位置示意图

（二）新村生活

关于当年新村内的标准设施，Sandhu（1964）称：

一个标准的新村拥有的设施包括警察局、诊所、学校、民众会堂，以及一些食物极度短缺的新村中还设有公众食堂。一道铁丝网围篱将这些公共建筑、村民住所、养猪场和私人园地都圈在内。²⁷

²⁷ 原文为：The standard New Village possessed such amenities as a police post, dispensary, school, community hall and, in villages under severe food restriction, a communal kitchen. A wire fence enclosed the public buildings, settlers' houses, pigsties, and domestic gardens.

此外，再按其典型新村的平面图来看，还应有华人寺庙、篮球场、足球场等。这跟林廷辉与宋婉莹（2002：13）所记述的新村设施基本一致。其云：

一般的新村在成立时都设有以下的基本设备：1.警察局；2.诊疗所；3.小学；
4.民众会堂；5.篮球场、足球场；6.养猪场；7.神庙。

武吉摩新村相比之下，村内的设施简陋得多。首先是村内原本就有的华明小学，以及一个也是原有的足球场；此外，警察局、诊疗所、民众会堂、篮球场、养猪场等统统都没有。目前村内的政府诊疗所和民众会堂都是后来所设。至于神庙，则仙师宫既然已经围在新村外，则新村围篱内的唯一宗教场所就仅剩真空道堂。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村内原有的足球场，在围起新村后反而荒废了，林意追述：

现在华明小学斜对面的空地上，即早年公共工程局办公室附近，在设置新村前原来有一个足球场。早年各民族的孩子都在那里踢球，原本相当活跃的。后来围起了新村之后，各民族孩子也不一起踢球了，足球场没有人使用，开始荒废，渐渐地就没了。

此外，根据1961年*Singapore Free Press*（1961）报道，当年新建成的巴冬的政府诊疗所耗资130,000马币，并且是马来亚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柔佛州的第一所乡村地区医护中心”（Johore's first rural health centre）。这个“加强乡村地区的医疗服务”（health services for villages）计划，首次在1959年的《英文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 1959b）公布，并列巴冬为首批九个建设诊疗所的乡村之一。上述政府诊疗所由柔佛州州务大臣Dato' Haji Hassan bin Haji Yunos开幕，同一天内开幕的还有耗资40,000马币的巴冬民众会堂，也同由州务大臣主持仪式。（*Singapore Free Press*, 1961）

这足以证明巴冬地区是直到解除“黑区”，乃至于独立后，才获得这些应有的设施。

由此可以想见，基于缺乏各种设施，又受到严格管制，当时新村村民的生活起居极为不便，加上物资贫乏，因此生活质量不高，而且生活单调。根据多位采访人的口述，当时村民多为周围橡胶园里的割胶工人，包括十来岁的孩子都得天天一早外出割胶，中午左右回来再准备去上学。比如当时十一二岁的苏江河回忆：

新村的铁栅门每天早上六点开门。我们小孩子也和大人一起排队出门去橡胶园割胶。进出铁栅门的人都得检查身份证，否则就会抓起来。我们工作的橡胶园在东边，因此每天从东边的出口出去，一般约几十人等着出门。铁栅门有保安队搜查出门人所带的物品，规定很严格，不允许带任何食物，也不能带香烟；最多只允许带一小瓶咖啡，若是大的瓶子则只能装半瓶。另外就是割胶刀。我们小孩子因为要上学，所以大概中午前十一点左右回来。到家之后吃午餐就去学校上学。当时大家都很穷，说是午餐，其实通常只吃粥配一点菜，或者豆腐。

林意的口述也基本一致，另外他还提到了上学的情况：

当时华明小学连同校长也才三四个老师，学生则十余人，分成三个班级。我们学国文、英文、数学、科学、历史，还有尺牍。我们到学校，通常都得先帮忙清理校园，包括除草、清水沟和卫生整洁。校长和所有老师也都一起动手做。那时候村里的孩子都在新村唯一的学校华明小学上课。但华明小学那时只有1-4年级，5-6年级就得到村外巴冬地区的华育小学，至于中学则最近的就是麻坡。当年的华明小学因为老师比较少，学生也不多，上课不按年级分班。同一个教室里，老师按照不同年级的科目和课业，各别给予教导。我们的英文老师非常严格，要求很高，给我打下比较好的基础；所以后来5-6年级到华育小学之后，很多其他学生由于英文程度较高跟不上而辍学，但我还是应付得来。

那时候生活资源极度缺乏。林意回想当年的生活境况云：

那时候的屋子都是木板和亚答屋顶；家里都没有电灯，我们还是烧油灯。当时家家户户都养猪和鸡鸭，也自己种菜。巴冬一带地区自来盛产椰子，有一种叫“椰块”（ya-kor）的饲料，即一种椰干，是由椰肉经提炼油之后剩下的椰渣压制成饼，约一寸厚，我们小孩子经常就去买来喂鸡鸭。当年米是限制品，每家都是按照配额到固定米店去买。大约是一人一周三斤，凭身份证去买；规定到巴冬大街的“合泉发”杂货店买米。米受限制，不够吃，但面粉则不限。因此村民多大量买面粉，做成面条；一般买大包装，一包二十五公斤。食油也不受限制，但是不允许携带出新村，都是罐头装的。我们很少吃饭，一般喝粥；配菜包括豆干、豆腐、豆腐乳、江鱼仔、花生米、酱黄瓜，等等。此外，村民经常会采橡胶树上长的一种白菇，更普遍的是地上长的一种红菇，也会摘野菜。另外常吃的还有木薯、木薯叶。当年的河水和水沟的水都很清澈干净，小孩子还会在水沟里拣田螺回家煮了吃。

苏江河、林忠义、陈彪太太等人对于饮食都有相同记述。尤其陈彪太太甚至提及，当年生活非常贫困，曾经连续三年没吃过一口米饭。至于村里的电灯，根据1962年的报章，当时称连同巴冬在内的麻坡地区四个乡村的2,000人口将在近期内获得电流供应（*The Straits Times*, 1962）；可见此前确实并未设置电线，村内也就没有电灯。²⁸

除了生活物资的匮乏，村民还经常受到英军及其雇佣兵的突击搜查。受访人都谈及，围起新村期间曾发生过二三回的突击搜查。通常情况如下：

²⁸ 实际上早在1937年政府就已准备给巴冬和巴力峇九提供点灯（*The Straits Times*, 1937），但却迟至独立后的1962年才最终实现；相信这是日军侵略，以及和平后很快又转入紧急状态有关系。因此工程就这么拖延了下来。

一百余人雇卡兵、斐济兵带着军犬突然进村，会由政治部与马华人员随同。一般大约下午至傍晚时间进村。这时村民都得全部离开自家住屋站在马路边，军人则挨家进屋子翻箱倒柜地搜查。曾有过“黑车”进村子认人。那是一辆军用吉普车，前座由军人开车，后座以黑帆布遮盖，马共投降者在其中，只留小孔供其双眼看出来；车子慢慢驶过路边的村民，目的是让帆布内的马共投降者指认同伙，包括同情者与曾帮助马共的村民。

这种时候，村民都极度恐慌。好在整个新村时期，并未发生重大马共与英军的枪火冲突，也未有人在搜查行动中被检举或者遭到逮捕。因此整体而言，村民生活还算平静，并未受到政府过度的恐吓与监控。

新村内并未建设篮球场等供村民娱乐活动的场所。所有受访人印象最深刻的都是每周一次夜里的公开播放电影。如苏江河记述：

新村正中央的大路设置放电影处，地点在当时保安队会所附近路口处。每个星期会放一次电影，都由新闻部负责。每次都会先播放反共宣传片，如剿共纪录片、马共党员处死图片、反共宣传歌曲等等。比如有一回播放抗日歌曲《保家乡》改写的反共歌，并要村民一同唱。此外经常也会有新闻部、政治部或马华领袖上台演讲，比如巴冬马华支部主席张南星就经常演讲。当然，宣传完了都会播放娱乐片给村民看。

除此以外，林意还曾追忆当年村内小孩子的娱乐游戏，即当年经常会有外国牧师进村，到每户家庭里给小孩子玩一些益智游戏。牧师会先进行示范，若小孩子跟着也能学着做，牧师就会将游戏送给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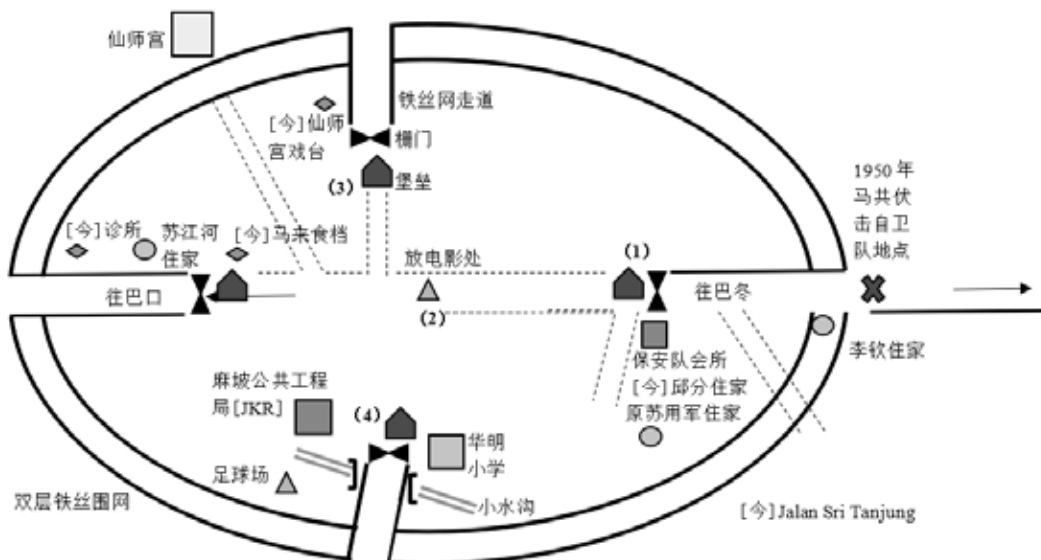


图5：武吉摩新村围篱及村内重要设施位置示意图

五、解除“黑区”与马共投降

1954年武吉摩解除“黑区”，结束四年来铁丝网内受限制监管的新村围篱生活。接着1958年马共中央南马局书记何浪带着整支部队缴械投降，这对马共斗争运动的影响极大；包括导致武吉摩马共支队由于断了组织的联系而最终投降，结束抗争。根据受访者的记述，几乎所有人对当时宣布“白区”的情景都无太多印象，都声称当时并未有任何庆祝或者仪式，村民的反应很冷淡。比如苏江河回忆：

当时新闻部的车子进村用大喇叭宣布解除戒严，但村民都没有太大反应。对于解严的消息，村民们多彼此口传耳闻。没有什么特别仪式或者庆祝活动。记得好像有罗里进村来，在罗里上直接搭起表演台，有唱歌跳舞。其实村民的生活基本一切照旧。唯一觉得高兴的是解除门禁，出入自由方便多了。还有，解严后大路中央的电影处还是继续播放电影，记得初始阶段播放的是庆祝宣布“白区”的宣传片。

其余受访者的记述都基本一致，均表示当时村民的反应较冷淡；对当时的庆典仪式都无印象。

麻坡县内的新村解除“黑区”分为两批。第一批是1954年11月8日，第二批则是1956年7月26日；这分别为柔佛州的第四批与第五批宣布“白区”的范围，此前三批则依序为丰盛港、峇株巴辖、笨珍。

1954年11月8日解除“黑区”的范围，当年蔡明歧（1954）报道：

此新“白区”范围共达一百六十平方英里，人口共十一万七千名，其中华人占四万五千五百名、马来人六万七千名，此地区系属麻坡滨海区域，在士牟拉以西与双溪吉星一带。其所包括之乡村计为双溪巴巴朗、利丰港、美南地、巴力峇加、双溪玛地，以及巴力爪哇²⁹、双溪拉惹尔巴克利之南部。今后上述各地之十一万余居民将免受紧急法令一切之限制，而过着太平愉快之日子。

此外，报道另附有清楚的“白区”地理示意图，其中巴冬与武吉摩明确都划在新宣布的“白区”范围内。

²⁹ 原文书写地名有误，如“巴力爪哇”误作“巴少爪哇”，而“巴力峇加”不仅错字，且还分作两条，误作“巴少、峇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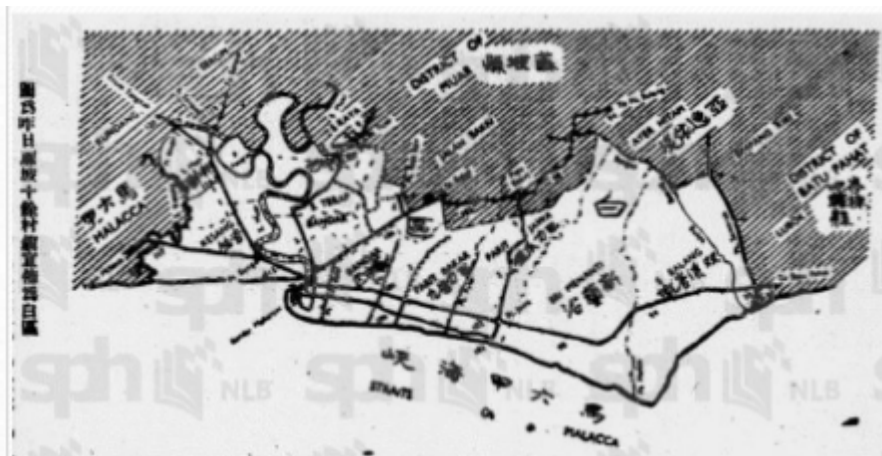


图6：1954年麻坡县内宣布为“白区”的范围（图片摘自蔡明歧，1954）³⁰

至于1956年7月26日宣布的“白区”范围，《南洋商报》报道得很详细：

柔佛政府今日再度宣布第二次麻坡白区范围扩大，其被正式宣布白区之地区计为什廊、班卒、武吉巴西及亚逸依淡四区，其范围即系自麻坡属过港武吉港脚之下棚门起，东至什廊及什廊三条，然后跨过麻河而至武吉巴西市区及巴西头条、二条，即沿巴西班卒公路左旁地区以迄班卒街场边之小溪为止，再从武吉巴西十英里处向东折向峇吉里区而至亚逸依淡，远至麻属与峇属之巴力四郎交界为止，全区面积计为七十五方里，居民为二万人。（《南洋商报》，1956）

调查中发现，村民对于解除“黑区”的时间众说不一，而且多数人都已是印象不清。然而综合上述资料，可以肯定武吉摩新村解除“黑区”是在1954年11月8日。³¹

至于当时宣布“白区”的方式及其仪式，1954年报道其盛况云：

³⁰ 本文摘录的旧报章图片资料，均由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电子资源网站下载：<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

³¹ 英文《海峡时报》的报道就没有《南洋商报》那么清楚，甚至容易引起误解。比如1954年的报道称：“士牟拉与双溪吉星之间的麻坡沿海地区160平方里的范围于今日宣布为白区。”（One hundred and sixty square miles of the Muar coastal plain between Semerah and Sungai Kesang was today declared a White Area）（*The Straits Times*, 1954）尤其容易引起争议的是1956年的报道称：“这些地区包含亚逸依淡、巴力爪哇、巴力峇九、峇吉里路、柔勒、班卒、玉射和什廊的部分地区。”（The area comprises part of the mukims of Ayer Hitam, Parit Jawa, Parit Bakar, Jalan Bakri, Jorak, Panchor, Grisek and Serom）（*The Straits Times*, 1956）尤其文中提到“巴力爪哇”的部分地区，但却未具体指哪部分地区。然而从《南洋商报》（1954）所附的示意图看，这应该是指原十支村落的丁字路口一带通往巴力士隆的地区。

宣布“白区”之隆重仪式，于今晨十一时在麻坡丹絨黄金大草场举行，参加盛会者有英国驻柔佛顾问官苏马威、柔佛州摄政王东姑马古打、柔佛州务大臣拿督依不劳欣、麻坡县长押罗拉诺阿沙、华人事务官蔡松林、太平局绅余金鉴、麻马华公会会长陈时试伉俪、柔新闻部主任何勿、柔州警察总署，及当地居民、各报记者等共逾数千人，盛况空前。（蔡明歧1954）

仪式的展开，首先是柔佛州摄政王东姑马古打（Regent of Johore, Tungku Makhota）上台演说，接着是英国驻柔佛顾问官苏马威（British Advisor, Muar Administrative Officer, Mr D. A. Somerville）的演说。报道称：

当英顾问官发表“白区”演说时皇家空军部一架飞机低空经过大会场散发大批“白区”传单时在场群众高呼欢愉万分，隆重之宣告“白区”大会乃告圆满结束。（蔡明歧，1954）

文中并未说明传单上的内容，而据1956年那次宣布“白区”仪式的英文海峡时报报道，则称：

一架“声音”飞机事后飞过这个新的“白区”进行广播与分发传单，公告人民，他们从此可以不受限制地购买、储存、携带并食用各类食物，以及各类物品。传单上说：“你们在紧急状态时期的最艰难日子里对政府坚定的忠诚，以及你们对于共产主义毫不妥协的态度，为你们自己赢得了生活在‘白区’里的权利。”³²（*The Straits Times*, 1956）

白天在麻坡市区广场上的仪式结束后，晚上则在新村地方展开娱性表演活动。根据蔡明歧（1954）报道云：“今晚该十余乡镇居民，分别在各地演剧或跳‘弄迎’舞，热烈庆祝他们光荣的日子。”

以上宣布仪式及其盛大庆典主要在麻坡市区举行。至于巴冬地区，则在当年的11月29日隆重地举行了一次全村的盛大庆典。当天全村的商铺都休业一天；盛典由下午开始，先是一段重要人物致辞的“茶叙”。根据报道称：

庆祝会于下午四时半，在华育学校举行，到会之华巫人士及来宾，数约三百余人，新闻部广播车，亦莅场播唱音乐。麻坡方面之来宾有巫统主席端哈二亚山，议员仄须礼曼，闻侨则有太平局绅吴志贤氏，情况至为热烈。庆祝会开始，首由哈二玛末村长致词，渠对此次能获得宣布白区，至

³² 原文为：A ‘voice’ aircraft later flew over the new ‘white’ area broadcasting and dropping leaflets, which told the people that they could buy, store, move and consume foodstuffs and other articles without restriction. “Your staunch loyalty for the Government, and your uncompromising attitude towards the communists, has won you your right to live in a ‘white’ area,” said the leaflets.

感欣慰云。续由张南星、林孝铭、吴志贤，副县长仄沙立、仄须礼曼等相继演说，均对白区极表欣慰，并寄望以能永恒保持此好现象云。最后茶叙尽欢而散。（《南洋商报》，1954）

“茶叙”结束后则是晚上的庆祝活动，报道称：

入晚并举行提灯游行。各港均派队参加游行队列。观众妇孺数千人，途为之塞，热闹情况可谓空前。此次并聘中华闽剧团表演两天。

（《南洋商报》，1954）

此外，当天恰值巴冬翠美古庙重修工程完竣，迎神出游，并请潮剧团“老玉堂春”表演三天。因此当天这二大庆典同日举行，盛况空前。（《南洋商报》，1954）

当年报章的报道以及政府热烈的仪式，反观村民口述中的新村内冷淡的表现，二者之间形成强烈对比；究其深层心理，不排除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村民对新村圈禁式生活的怨怼。尤其我们发现，村民口述当年宣布“白区”时的情景，其中最突出且一致的印象，即：解除了门禁，大家进出都自由了。

解除“黑区”的第一个变化即保安队撤退，而且铁栅门从此打开，不再有门禁。然而铁丝网围篱却并未拆除，而是任其自行毁坏。经过一段时间，有些瘫坏倒下，有些人拆下捡去；久而久之就都清除掉了。

新村内的居民从此可以自由进出活动。解除“黑区”后多数村民仍选择继续住在新村里，只有少数人搬迁他处。比如苏江河曾讲述一户陈姓家庭，解除“黑区”后迁回十支附近的原村落一带，但那里已是马来人的聚居点；孰料过不多久遭到入室劫匪杀害，全家罹难。

解除“黑区”后，国际红十字会进入村内，设起红十字医护处，红十字人员开始给村民提供医疗与卫生等服务。这也同时可以佐证上文所提的，巴冬地区的政府诊所是到了1961年才开始建成投入服务的。

再说1958年8月26日，马共中央南马局书记何浪走进昔加末以北Kampung Tengah的警察局里投降。这对柔佛州的马共活动影响极大，报道则称：随着这次事件，柔佛州北部的组织也跟着瓦解了。³³（*The Straits Times*, 1959a）

属于柔北地区的武吉摩马共支队，此时仍在森林里抗争，然而由于切断了组织的联系，几乎遭到完全孤立，当时唯一相互通气的仅古来的马共支队；而随着1959年古来支队自行解散，武吉摩支队也在1960年由林克明带领支队十二人出来投降。何浪投降事件的影响所及，柔佛州北面一整片地区成为了当年新宣布的“白区”。

³³ 原文为：With these events the ‘South Malaya Bureau’ of the Communist Command no longer existed and the terrorist organization in north Johore collapsed.

时至近期，根据林廷辉与宋婉莹（2002：148）的数据，1995年武吉摩新村的人口为1200。根据我们前文对新村初期1950年人口总数的推测，经过45年后武吉摩的人口翻了一倍，增长率为100%。这个数据置于麻坡县内19个新村人口变化的平均数据基本相当。³⁴

六、结语

新村是马来西亚华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下集体经历磨难的一记烙印。正如林廷辉与宋婉莹（2002：14）所说：“村民的苦难生活并非今天的大马华人所能了解与体会。”在战后物资匮乏的年代，被迫背弃家园，住进高高的铁丝网团团围起的新村内，受监控管制；同时夹在马共与英军之间受威吓受胁迫，日夜担惊受怕；加上频繁的炮火枪击，加上英军展示马共死难者的恐怖画面，其中经历的精神与心灵折磨，确实超乎想象。

武吉摩新村的村民自战后以来，从排华事件到紧急状态，以至围起新村，可说无一刻安宁日子。然而村民们顶着深重的身心创伤，不论是在劫或者劫后，展现出人类精神最光辉的意蕴，数十年来一步一脚印地铺展开一个社区的历史面貌。然而不知是愈合的伤口同时也掩住了记忆，还是封合的记忆同时也抚平了伤口，这些受访人追叙起当日之种种，平淡的语气中总间断式夹杂着浑然不以为意的空白点。他们的童年都笼罩于一圈高不见顶的铁丝网，但他们今日的生命却体现出高于其上的内涵；只是历史毕竟还是欠着他们一个交代，你我并负上了份内的债。

Nyce（1973）和林廷辉与宋婉莹（2002）是目前为止对新村历史与新村生活所做的最详尽而全面的记录与整理。他们都偏于概括式的宏观论述，当然也结合个别新村的采访记述展现出各地村民实况的些许微观视角。我们对武吉摩新村及其前后史实的调查记录，希望做到尽可能真实而全面地还原历史。整体上我们发现武吉摩新村与上述全国新村概况的记录大体有较多一致性，但却也有不少其自身的独特性。

从新村历史研究的角度看，纵然是白纸黑字的政令，各地执行起来仍难免五花八门。目前正是尚欠缺对各地新村移植实际过程与村民生活状况的详细记录与描写。对当年经历武吉摩新村戒严时期的村民，我们不能蒙住双眼拿起官方文书中的宏观概况直接劈头盖脸地往他们身上套；而完全漠视其曾经亲身经历烙下的那一道道伤痕所述说的故事。

武吉摩新村如此，其余新村亦然。惟其如是，才算是还了历史的一个交代；更尤其是就新村历史的研究而言，只有这样才算是最真实而客观地还原新村的真相。我们对新村的分析与描述才能做到尽可能地准确。

³⁴ 林廷辉与宋婉莹（2002：148-149）所列麻坡县内19个新村，除了武吉摩新村，其余18个都列有新村初期与1995年的人口数据。其中巴口新村由于后来发展为工业区，外来人口激增，因此由1950年的2,500人增至1995年的12,000人。其余17个具备完整数据的新村，从新村初期至1995年其平均人口增长数量为1,462人，至于平均增长率则为119%。与此相比，武吉摩新村人口增幅为600，增长率为100%。这应该是属于正常水平。

参考文献

- 阿都拉西迪, 2010, 《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回忆录》, 吉隆坡: 21世纪出版社。
- 蔡慧钏, 2017, 《巴冬田野调查笔记——林意忆巴力加心老宅》, 《学文》, 第12期, 页62-68。
- 蔡明歧, <麻十余村镇宣布为白区>, 新加坡: 《南洋商报》, 1954年11月8日。
- 陈正华, 2012, 《刻骨铭心的血迹——记载马来西亚第一宗, 全国种族屠杀事迹》, 吉隆坡: 陈正华。
- 何启才, 2014, 《锡米山华人社区的形成与变迁初探》,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 第17期, 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页79-100。
- 胡一刀主编, 2012, 《爱新村——雪州华人新村的美丽与哀愁》, 雪兰莪: 雪州新村发展常务委员会。
- 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 2003, 《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 新山: 南方学院。
- 《叻报》, 1895年10月8日。
- 李永球, <麻坡的风情>, 《光华日报·副刊》, 2017年1月7日。
- 廖文辉, 2012, 《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 加影: 新纪元学院。
- 林廷辉、宋婉莹, 2002, 《马来西亚华人新村50年(修订版)》, 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 麻坡15华团, 2005, 《麻坡华人的血泪史》, 麻坡: 麻坡15华团。
- 麻坡华侨殉难义烈史编辑委员会, 1947, 《麻坡华侨义烈史》, 麻坡: 麻坡中华公会。
- 《南洋商报》, 1954年12月2日。
- 《南洋商报》, 1956年7月27日。
- 彭西康, 2016, 《重拾历史的记忆: 务边华人先贤的故事(1850-2000)》, 霹雳: 务边文物馆。
- 邱克威, 2017, 《武吉摩义山的“冢”字墓》, 《学文》, 第11期, 吉隆坡: 学文社, 页48-54。
- 《星洲日报》, 2014年7月15日。
- 《星洲日报》, 2017年8月23日。
- 张礼铭, 2016, <麻坡武吉摩的历史>, 《学文》, 第10期, 吉隆坡: 学文社, 页74-81。
- 张佐, 2005, 《我的半世纪——张佐回忆录》, 吉隆坡: 张元出版。
- 郑昭贤, 2009, <麻坡老抗日军忆往事>, 郑昭贤著, 《东南亚华人精神坚韧不拔》, 吉隆坡: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页102-105。
- 郑昭贤, 2016, <柔佛苏丹铁路梦——麻坡铁路兴衰史>, 《学文》, 第10期, 页82-89。
- 郑昭贤, 2018, <林文图与麻坡义兴公司>, 《学文》, 第13期, 吉隆坡: 学文社。
- Corry, W.C.S. 1954. *A General Survey of New Villages*.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 George, A. 1955. *He Hunted with the Sultan of Johore*.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4 November.
- Malaya Tribune 1930. *State of Johore, Annual Report for 1929*. Kuala Lumpur: Malaya Tribune, 15 September.
- Mohamed Hashim 1931. *A Pioneer*. Singapore: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1 November.
- Nyce, Ray. 1973. *Chinese New Villages in Malaya*. Singapore: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 Sandhu, K.S. 1964. "Emergency resettlement in Malaya".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18:157-183.
- Singapore Free Press 1961. *Johore's First Rural Health Centre Opened by Mentri*. Singapore: Singapore Free Press, 15 November.

The Straits Times 1910. Progress in Muar.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22 November.

The Straits Times 1937. Electrical light for Muar village.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21 November.

The Straits Times 1954. Coastal plain of Muar is now ‘White’ - and gap is closing rapidly.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9 November.

The Straits Times 1956. They resisted reds - area now white.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27 July.

The Straits Times 1958. Johore White Area.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28 August.

The Straits Times 1959a. Terrorist Casualties.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21 June.

The Straits Times 1959b. Health service for villages stepped up.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12 October.

The Straits Times 1962. Electricity for 2000.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17 May.